



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

刘守刚 刘志广 主编

# 中国财政问题

罗介夫 著  
于广 整理

贯通古今中外，从古埃及述  
至日本明治维新，批判性反  
思中国财政现代化在近代的  
转型困境

中央銀行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

刘守刚 刘志广 主编

# 中国财政问题

罗介夫 著  
于广 整理

贯通古今中外，从古埃及述  
至日本明治维新，批判性反  
思中国财政现代化在近代的  
转型困境

中央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财政问题 / 罗介夫著; 于广整理.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4  
(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

ISBN 978 - 7 - 5476 - 1983 - 4

I. ①中… II. ①罗… ②于… III. ①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812.0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26773 号

责任编辑 陈占宏

封面设计 刘 斌

## 中国财政问题

罗介夫 著 于 广 整理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7

插 页 1

字 数 364,000

版 次 202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6 - 1983 - 4 / F · 726

定 价 118.00 元

# 主编的话

为什么要新编这套近现代财政学名作？那个年代的财政学者的思考与努力，为什么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来新编这套丛书？这是我们在新编这套丛书之前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希望借此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新编这套丛书的初衷。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学要完成这一使命，就要基于国家治理视角推进基础理论的创新。但基础理论创新从来不是“无中生有”或“前无古人”的事业，它必然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与成长脉络。

对中国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需要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主要针对的就是“二战”以后所形成的主流财政学的缺陷。这种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主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选择范式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它以孤立个人主义作为方法论，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分析为手段，将财政问题变成了一种工程技术问题，完全忽略了制度与历史等问题。可问题是，政府的财政行动兼具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与行政管理等多重属性，是在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产物，其中还始终伴随着各种价值判断和评估，这远非价值中立下的均衡分析和最优化分析所

能适用的。此外，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显示出，财政对国家和社会的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决定作用，一国的财政史往往是其国家历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财政社会学/财政政治学的研究都主张通过财政来探究国家的性质、前途和命运<sup>①</sup>。

在推进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时，我们要认识到，在财政学的研究传统或财政学思想史中，除今天主流财政学这种选择范式外，还存在基于欧陆传统的交换范式<sup>②</sup>，它将财政学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虽然当前我国财政学界对这一传统并不熟悉，但这一传统却是财政学最早传入中国时的主要传统，是从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流行的传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就是要延续或回归这个在中国曾经存在并中断多年的传统，这也使中国学者的努力可以成为国际学术界自20世纪末以来重建财政学理论体系努力的一部分<sup>③</sup>。由于中国具有利用财政工具进行国家治理的悠久实践和思想传统，并且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所提供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将使中国学者有可能为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 二

虽然中国有丰富且源远流长的古典财政思想，但对近代中国来

---

<sup>①</sup> 财政社会学/财政政治学的上述主张可参见葛德雪：《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路径》，载《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刘守刚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刘志广、刘守刚译，载《税收哲人》附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sup>②</sup> 关于财政学不同研究范式的辨析可参见马珺：《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载《财贸经济》2015年第7期。

<sup>③</sup> 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财政学者理查德·瓦格纳，他根据财政社会学和意大利财政学传统而创新财政基础理论，代表作为《财政社会学与财政理论》（中文版即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说，财政学的发展却主要是“西学东移”<sup>①</sup>的结果。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古典财政思想从总体上并不适应现代要求，需要加以改造或发展。魏源（1794—1857）的财政思想，被称为“标志着我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sup>②</sup>。后来冯桂芬（1809—1874）等晚清学者继续呼吁“采西学”，但现代财政知识的传播在此时仍步履艰难。有些学者，因去国外考察后而由传统教条的卫道士变成现代财政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如王韬（1828—1897）；而有些人即使出使国外多次，也仍坚决反对西法，如刘锡鸿（？—1891）。就总体而言，到19世纪末期，中国引入和运用的是西方财政学知识，除马建忠（1845—1900）和严复（1854—1921）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深入到财政理论的层面。对近现代财政理论的了解和理解的不足，也成为洋务运动派和维新运动派的重要局限。

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不断提升的曲折的历史过程”<sup>③</sup>。对财政理论的传播与研究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近代留学生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留日学生胡子清（1868—1946）于1905年在东京出版的《财政学》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出版的最早财政学著作<sup>④</sup>。不少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财政学，还有一些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就是直接研究财政学或财政问题的，很多在国

---

① 与之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西学东渐”，主要是指明末清初并且延续到清朝中叶，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后来逐渐蜕变为“西学东源”，这使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近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机遇；而“西学东移”，主要是指晚清到民国随着中国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科技和近现代科学引入。具体参见刘大椿等：《西学东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② 参见胡寄窗和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573页。

③ 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④ 参见许康和高开颜：《百年前中国最早的〈财政学〉及其引进者——湖南法政学堂主持人胡子清》，载《财政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

外出版，取得了较高的国际学术地位<sup>①</sup>，一些留学生甚至直接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财政学家<sup>②</sup>。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传播和研究财政理论的主体力量，虽然他们有的进入学界，有的进入政界，有的则辗转于学界和政界之间，但他们在繁忙的教学或政务之余，仍积极从事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或者撰写了大量财政学教材与专著。从数据上看，自晚清以来，财政学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占据了经济类出版物的主体地位，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财政类出版物有2181种，其中，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为1090种<sup>③</sup>。胡寄窗对1901年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的多角度统计分析表明，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排在第一位，位于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之前<sup>④</sup>。

近代留学生对财政学的学习、研究以及国内财政类著作的出版繁荣，直接反映了财政在从传统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很多当时的财政学著作直接回应了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其中很多是基础性问题，具有超越时代的价

---

① 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一书的第四章，邹进文专门考察了近代留学生与财政学研究，其列出的留学生及其博士论文有：马寅初的《纽约市的财政》、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李权时的《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中央、省、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研究》、陈岱孙的《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尹文敬的《中国税制》、朱炳南的《经济剩余与税收》、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田炯锦的《英美地方财政的国家监督研究》、刘炳业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资本税（1919—1923）》和周舜莘的《资本税》；其中，马寅初的《纽约市的财政》在1915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中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帕特森的积极评论，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被列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丛书，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的英文版在1970年获得再版，等等，具体参见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如马寅初、朱进和寿景伟都师从著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教授。

③ 参见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值，他们对当时财政制度利弊的研究及对财政改革的思考，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借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那个古今中西交汇的年代也是财政学在我国的早期发展阶段，那批学者往往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传统基础，又大胆吸收了来自西方特别是欧陆财政学的理论，从这些财政学著（译）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学界先辈们接受、消化国外财政学思想的努力，还可以看到他们融通古今中外财政思想以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的努力。

### 三

虽然通过其他人的系统研究<sup>①</sup>，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财政学著（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每个人在做研究时，对思想与材料的取舍会有不同，原版原论始终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这些年来国内也陆续再版了那个时期的部分财政学著作，但要么是单本（套）<sup>②</sup>，覆盖面非常有限；要么被纳入其他丛书当中<sup>③</sup>，学科特色难以凸显。同时，由于原本繁体竖排不大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且很多著作出版时间已久、印数又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图书馆所藏

---

① 如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胡寄窗和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等等。另外，中国期刊网上还可以下载关于相关著作与学者思想的专业研究论文。

② 如三联书店 2014 年再版的孙怀仁的《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中央财经大学整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出版的《崔敬伯财政文丛》（三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再版的达尔顿《财政学原理》的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再版的霍衣仙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主要涉及历代田赋、税制和币制）；等等。

③ 主要是指商务印书馆近年来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财政学著作 7 本，分别为马寅初的《财政学与财政——理论与现实》（2005）、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2010）、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2011）、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2011）、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2015）、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2017）和陈兆鲲的 *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a in the Tsing Dynasty, 1644—1911*（《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2017）。

书目非常有限，且被纳入古籍或近代文献范围，借阅也存在诸多不便。因此，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仍有必要挑选这一时期的部分优秀著（译）作，以丛书的形式集中进行出版。

在选择书目时，我们主要考虑下面几个因素：一是对于近年来已经新编出版的著（译）作，本丛书不再将其纳入出版计划，这样本丛书与已再版的书目可以形成互补关系；二是主题涉及尽可能广泛，以反映该时期财政学研究的整体面貌，涉及对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对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财政问题及通过财政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探讨，以及对国内外财政史的理论性探讨；三是著作出版期限为1900—1949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北伐战争前后及抗日战争前后这几个时间点的著作；四是将译著也纳入新编丛书，该时期译著的原版主要来自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它们既反映了当时国际上财政学研究的现状，也构成中国财政学思想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丛书整理出版时，除了将繁体变简体、竖排变横排外，我们尽可能保持书的原貌，以此为基础进行必要的校订，主要涉及专有名词、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的调整（详情请参见每本书的整理凡例）。另外，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所选书目的学术贡献及其与同时代同主题著作的内在联系，整理者为每本著（译）作写出了导读，并对文中提及的部分史实与原理加以注释。

相对于这一时期数以千计的财政学出版物来说，本丛书所选择和能选择的书目是极为有限的，还有很多优秀的著（译）作未能被纳入进来。但我们并不将之视为遗憾，因为新编出版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关注并重视这一时期的财政学著（译）作，进而推动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如果能初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将本丛书列入出版社“十四五”期间重点出版计划，不惜成本支持学术事业。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及弘信资本的高建明先生慷慨地为本丛书的出版提供资助。

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曹建社长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亲自参与了丛书出版的策划，更是经常亲自过问并安排相关工作的进度与细节。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诸位编辑悉心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精益求精为丛书增色不少。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丛书中各本书的整理者，他们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之余，不计名利地加入到这一工作中来，用他们的辛勤付出共同支撑了本丛书的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守刚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刘志广

## 整理凡例

为了读者阅读与使用的方便，本书在整理时除了将字体从繁体改为简体、将排版从竖排且从右到左改为横排且从左到右外，尽量保持原貌。在以下几个方面，整理者也做了一些改变：

1. 将因为排版变动原因而变化的表示方位的词加以改变；另外，对过去在用法上跟今天不同的专有词汇，也加以普遍的调整，见表1。

表1 文字用法调整表

原用词	现用词	改用说明
如左	如下	排版变化
计画	计划	写法变化
名辞	名词	写法变化
省分/月分	省份/月份	写法变化
部份	部分	写法变化
豫定	预定	写法变化
豫算	预算	写法变化
澈底	彻底	写法变化
发见	发现	写法变化
封锁	封闭	词义变化
佛郎	法郎	写法变化
开消	开销	写法变化

(续表)

原用词	现用词	改用说明
滩派	摊派	写法变化
沈沦	沉沦	写法变化
明瞭	明了	写法变化
藉	借	写法变化
土着	土著	写法变化
诺威	挪威	写法变化
丁抹	丹麦	写法变化
和兰	荷兰	写法变化
罗马尼	罗马尼亚	写法变化
陶磁/磁器	陶瓷/瓷器	写法变化
土耳其基	土耳其	写法变化
消售	销售	写法变化
仲介	中介	写法变化
乞靠里	巧克力	写法变化
元来	原来	写法变化
热中	热衷	写法变化
股分	股份	写法变化
万万	亿	写法变化
慕沙里尼	墨索里尼	写法变化
浑阳	沈阳	写法变化
唱	倡	写法变化
坎拿大	加拿大	写法变化
食粮	粮食	写法变化
付与	赋予	写法变化
斯密亚丹氏	亚当·斯密	写法变化
庞大	庞大	写法变化
射幸心	侥幸心理	写法变化
菲律宾	菲律宾	写法变化

2. 标点符号尽量使用原版，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阅读习惯进行了调整，如多个并列词汇中加“、”；列举原因中语意明显者加“，”；略述中首句后加“。”；引号前的“，”“。”改为“：”等。

3. 有必要改动的其他文字和数字，如公历纪年的写法，都改为文字表述，如将“一千九百年”写作“一九〇〇年”；属于原来排版错误的文字，则直接调整而不再加以说明，如将“微收”改为“征收”，“一万八千万”等改为“一亿八千万”，等等。

4. 对于原版中字体模糊不清或有漏缺者，以“□”代替，如“□议”“□决”，等等。

# 导 读

于 广

在罗介夫身上，能清晰地看到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渴求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焦虑和心切。《中国财政问题》这本书，很难界定它的学科性。它包含财政学理论，却不完全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去讨论；它针砭时弊，像是一本时事评论，却旁征博引，从古埃及述至日本明治维新；当然，它更不像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不以讨论史实或历史规律为目的。可读下来后，却有一种触动，似乎切真切实地听到，在那个愚昧与希望交织的年代，知识分子为民族存亡的呐喊。今日看来，这本书的意义，一是理论内容，二是史料功用，三是精神价值。



这本书受李斯特的影响很大，这与罗介夫接受教育的经历有关。1880 年，罗介夫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幼读私塾，后官费派赴日本京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日本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 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书中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他认为自由贸易在日本不仅难行，而且倘若行之，则其国必衰。保护主义论得到“维新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另一位政治家犬养毅也翻译和发表了多篇著论，宣扬保护论，“保护文明劣等国之产业，防御文明优等国之物产滥入。

故保护税者，实为制造未兴、商业未振之国所必行之政也”。<sup>①</sup> 日本的崛起，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在东方国家的成功实践，让很多国人看到后进国家迎头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希望。

罗介夫在日本读书期间，中国留学生翻译了大量有关李斯特的作品。1901年，留日学生在《译书汇编》上以《理财学》为名连载介绍李斯特学说，认为李斯特“力倡保护贸易之说者，以德国当时之情形，与我国相仿佛也”。<sup>②</sup>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中，也有多篇文章在介绍李斯特学说，比如重远的《外国贸易论》，称“李斯德氏国民经济之论……国民经济者，近世国家主义日益发达，知经济上之厉害，亦不可不以国民为标准”。<sup>③</sup> 留日期间的罗介夫，恨着日本，让中国陷入“东亚病夫”的泥潭，正如他在书中所讲，“列强以为中国尚有难侮的实力，自清日战后，以无名弱小的日本，而牛大的中国，与之连战连败，竟至屈辱为城下之盟，于是惊愕世界的视听，目中国为东方老大病夫”。<sup>④</sup> 然而，他却又羡慕着日本，将李斯特、德国和日本视为中国财政改革的出路，渴望用财政上的先进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财政上的根本整理，庶有一线曙光，而国家前途，亦将未可限量”。<sup>⑤</sup>

罗介夫投身于政界和教育界的时间远大于学术界，他对财政的发声，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其次才是一名学者。这与他早年接触的革命理念，以及认识的革命志士有很大关系。湖南籍留日学生在近代中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黄兴、宋教仁、杨笃生、陈天华、章士钊等都是早期坚定的革命者。罗介夫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回到湖南以后，与很多湘籍革命者一样，罗介夫投

---

① 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② 李士德（李斯特）：《理财学》、《理财学》（续），《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第8期。

③ 重远：《外国贸易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21期，第49页。

④ 罗介夫：《中国财政问题》，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年，第26页。

⑤ 罗介夫：《中国财政问题》，第14页。

身于教育界，开办新式学堂，秘密传播革命思想。禹之谟、黎尚雯、宁调元、廖钧焘等早期湖南革命党人与罗介夫甚是要好，其中，同是留日学生的禹之谟对他的影响颇大。1906年，禹之谟领导湘乡学界发起反对盐捐浮收运动，也因此被湖南巡抚庞鸿书逮捕，罗介夫虽奔走相救，也挽回不了禹之谟被杀害的结局。<sup>①</sup>此事对罗介夫的触动很大，罗介夫受禹之谟嘱托，继续办学，为掩人耳目，将禹之谟的惟一学堂改名为广益英算专科学校，暗中从事革命事业。<sup>②</sup>

在此过程中，罗介夫与国民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熟识，参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长沙新军起义，从此步入政界。罗介夫颇得谭延闿的赏识，其所在的广益中学在长沙北门外熙宁街的永久校舍就是谭延闿主政湖南时所拨。<sup>③</sup>后来，罗介夫追随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投奔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任职第三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北伐成功后，罗介夫任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与谭延闿的亲信彭国钧与张炯联系紧密，彭、张二人控制着湖南国民党党部，是牵制湖南军阀何键的重要一股势力，罗介夫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地方派系斗争中。<sup>④</sup>实际上，这背后又有CC系的身影。也正是在陈果夫的暗中支持下，彭国钧和罗介夫先后成为监察院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制约何键的一枚棋子。

不过，罗介夫虽深陷湖南的派系斗争当中，但其斗争不以个人升迁为目的，他的弹劾对象既有何键一派，也有与他毫无瓜葛的其他地方官员。比如1931年罗介夫弹劾河南特税处长李慕青提倡贩运、吸食鸦片；<sup>⑤</sup>1936年，罗介夫弹劾卫生署长刘瑞恒对部分收入隐匿不报、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30卷·人物志（上），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599页。

② 刘磊：《罗介夫与广益中学》，《档案时空》2007年第11期。

③ 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④ 李定国：《萧学泰案（宁案）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发行，1964年，第169页。

⑤ 《弹劾案：河南特税处长李慕青公然提倡贩运吸食鸦片案》，《监察院公报》1931年第2期，第97页。

舞弊营私，结果直接导致刘瑞恒辞卸了卫生部署职务，赴港从事医药器材的筹备运济工作。<sup>①</sup>当然，罗介夫的弹劾矛头主要还是何键，所指控事项以横征暴敛、搜刮民财、贪污受贿和盗卖砂矿等财政经济事务为主。尽管罗介夫的主要精力在政界，但他似乎又不太懂得官场的圆滑世故，知识分子的执拗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何键主政湖南时，花重金欲收买他，他不为所动；后来何键军权被剥，从湖南下野，调往内政部后，罗介夫仍联络“倒何派”方克刚、宾步程等人，成立湖南各界清算委员会，要置何键于死地。这样的执拗，也最终引来杀身之祸。1938年，何键秘派内政部警察总队中队长刘明善回湘侦查罗介夫的行动，刘明善指使一名欲攀附何键的基层官员孙毅（别号阳升）将罗介夫杀害。<sup>②</sup>罗介夫被害后，国民政府以高规格的礼仪公葬，湖南地方也为之立起纪念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亲自下令要严查凶手。不过，这场明眼人都清楚的刺杀，最后不了了之。何、刘、孙三人都未受到惩罚，罗介夫终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 二

在罗介夫的眼中，中国是千疮百孔的，与当时的欧、美、日相比，财政上的问题从上到下百弊丛生。在本书中，罗介夫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分别是“财政机关”“岁出入”“各项租税”“内外公债”，这也是全书的基本框架。

“财政机关”一编，讨论较多的是财权问题。他认为，我国历来的政治组织系采用地方分权主义，财政紊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上下财政机关，没有统属连锁的关系，复没有统一权力的运用，

---

<sup>①</sup> 《监委罗介夫等弹劾刘瑞恒》，《申报》1936年7月22日，第3版。

<sup>②</sup> 吴健人：《罗介夫被刺真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184页。